

“北斗八女”考

——另附汉译密教佛经中南斗北斗之汉化分析

吴 慧

汉译密教佛经中直接以北斗为题材的经文集中出现在盛唐，其中印度来华僧人金刚智所译《北斗七星念诵仪轨》经中，有“北斗八女”字样，同经文标题“北斗七星”相异，在《大正藏》所选用的几个版本经文中也有所同异。笔者比对相关文献考得此“北斗八女”并非“北斗七星”之讹写，其背后是道教的北辰北斗崇拜对密教的影响。比较僧一行撰写的《北斗七星护摩法》，可从中看出密教经文在北斗崇拜上的进一步汉化：不但形式上更接近道教经文，同时此经中首次出现对“火星入南斗”这一传统天象的攘灾之法，是将中土星占内容融入密教佛经中的一条明证，也是天学家身份的僧一行特殊的综合工作。笔者认为金刚智的译文，保留了唐以前道教对密教在北斗崇拜上的影响，而僧一行的工作，是对密教佛经的二次汉化。对这一过程的分析，有助于辨别北斗经文的成文时间上的前后顺序，也有助于理解史传及笔记故事中北斗所具有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北斗 南斗 金刚智 僧一行 密教 道教

作者吴慧，1979年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03级博士研究生。

《大正新修大藏经》，共收入四部以北斗为题的密教佛经，分别为：《北斗七星念诵仪轨》、《北斗七星护摩法》、《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以及《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四部经文中，《秘要仪轨》的体例和内容相对粗略，《北斗七星念诵仪轨》存在经文标题中“七星”和经文内容中“北斗八女”的差异，《护摩法》是身兼天文学家和密教阿闍梨身份的一行所撰，其内容是更值得考究的，今请撰文以记之。

一、“北斗八女”考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十一册，编号为1305的密教部佛经《北斗七星念诵仪轨》，为开元初年南天竺国三藏金刚智所译，《大正藏》以日本享保年间（1716—1735）刊丰山大学藏本为底本，又据久安五年（1149）写东寺三密藏本以及天永四年（1113）写高野山宝寿院藏本加以校注。此经为单卷本，篇幅短小，记录了北斗真言和供养之法并描绘了供养北斗星神所能获得的种种福报。经文开头写：

而时如来为末世薄福一切众生，故说真言教法。时一切日、月、星宿皆悉云

集，前后围绕，异口同音白言：“唯愿如来而为我等说于神咒。”于时世尊说八星咒。（例一）

经文中有：

其印明出金刚顶经七星品（例二）

又有：

佛告贪狼、破军等言：“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神咒，拥护否？”于时八女白世尊言：“若有人每日诵此神咒，决定罪业皆悉除灭，成就一切愿求。”（例三）东寺本于例二“七星品”处作“八星品”，宝寿寺本于例三“八女”处作“八星”。此乃北斗七星的供养仪轨，或作“七星”或作“八星”或为“八女”使人迷惑，一如萧登福先生在《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一书中所述“或言七星，或言八星，自启纷纭”，可惜萧先生在此问题上没有再多展开。笔者起初猜测“八星”是“七星”的讹写，但东寺本将“七星品”写为“八星品”，且三个版本都以“北斗七星”为题而内容中也都写“北斗八星”或“北斗八女”，足可见“八”并非“七”之讹写。

北斗七星用现代天文学的表述方法，从斗口起依次为：大熊座 α 星(天枢)、 β 星(天璇)、 γ 星(天玑)、 δ 星(天权)、 ϵ 星(玉衡)、 ζ 星(开阳)及 η 星(摇光)。道教中对这七星另有一套与之对应的称名，依次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和破军。七星中，大熊座 ζ 星（开阳）是一颗聚星，旁有4.0等的伴星，这两颗星常常被称为“左辅”“右弼”。

山东嘉祥县东汉武梁祠石刻中的著名“斗为帝车”图中，绘有北斗七星，另有一颗辅星，在唐代密经《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附有一张北斗七星称名图，在武曲星边标注有一颗辅星。但这两处的八颗星不能直接用以佐证金刚智经文中的北斗第“八”星即是此辅星。比对密经中各种与北斗有关的记录，可以发现在密经中存在将北斗、北辰通用的现象，笔者猜测，“北斗八星”是将北斗、北极并称，其中北辰，即北极星，极有可能被编排为北斗的第八星。

1、八星咒即七星真言

与金刚智所译《北斗七星念诵仪轨》内容接近的密教佛经，另有僧一行所撰《北斗七星护摩法》以及大兴善寺翻经院灌顶^①阿闍梨述的《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和标为婆罗门僧将到此经唐朝受持的《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

金刚智所译《北斗七星念诵仪轨》中记“八星咒”为：

飒 而曩野伴惹密惹野染普他摩娑 弭曩 乞山婆 都莎呵。

僧一行所撰《北斗七星护摩法》中记“北斗七星真言”为：

飒哆曩而曩野伴惹蜜惹野野染普他摩沙 弭曩 讖山婆 都娑婆贺。

虽然不能看到这两段陀罗尼的梵文原文，但两段汉译的字音或用语基本一致，说明金刚智经中“八星咒”即是供养北斗七星时的真言，也可知，八星的所指即为北斗。

2、“北斗”和“北辰”存在通用的现象

^① 此处的灌顶，并非隋唐之际天台宗的法号为灌顶的大和尚。

今考《大正藏》所录的各部佛经中（主要出现在密教部佛经中），“北斗”常与“南斗”连用，写为“南斗北斗”，但有时也写成“南斗北辰”。例如：

二十八宿失度，金星、彗星、轮星、鬼星、火星、水星、风星、刀星、南斗北斗、五镇大星、一切国主星、三公星、百官星、如是诸星各各变现。（《佛说仁王般若波罗蜜经卷》，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

尔时有一外道旃陀罗女，专行众恶符书厌祷。或事山神、树神、树下鬼神、日月五星、南斗北辰，一切魍魉杂魔邪魅惑尊者阿难及诸善人。（《佛说六字神呪王经》失译人名所附为梁录）

与之重复的经文不再举例。“南斗北斗”和“南斗北辰”的用法，说明“北斗”和“北辰”是通用的。在晋代的《七佛所說神呪經》中，名“北辰”为“妙见菩萨”：

我北辰菩萨名曰“妙见”。今欲说神咒，拥护诸国土。所作甚奇特，故名曰“妙见”。处于阎浮提，众星中最胜。神仙中之仙，菩萨之大将。光目诸菩萨，旷济诸群生。（《七佛所说神咒经》卷二，东晋译本）

经中供养“妙见菩萨”，并祝祷消灾除难、增算益寿，从祝祷所获的福报来看，同供养北斗所获之福报相同。

从上文所引的密教佛经内容来看，“北斗”和“北辰”存在着通用的现象。

3、密教和道教在北斗崇拜上相当接近

从现存的道藏经文中有关北斗的经文来看，即可知北斗崇拜是道教的一项重要内容。道教中的北斗，主要的星占含义是能够消灾、度厄、增算，在星占含义上，密教与之是相当接近的。试举两例说明：

《上清太上回元隐道除罪籍经》^①中，在不同的日期分别供奉北斗七星中的一颗，以求消除罪籍，如于“甲辰之旬丁未之日夜半之时”，供奉“北斗第五纲星天平丹元玉衡魄灵上元君上玄九皇”，“祝曰：‘愿得除（某）七世已来下逮某身内外秽罪，表里洗过数千万万亿记在幽关者，皆令消除’”。

以北斗来除罪解厄以求益算的思想也出现在其他道经中，如《上清洞真解过诀》中的《太上回元隐道用除罪籍回元五通之日谢过第七》在其他道教经文中，北斗七星的星占意义与上述二经有所类似，意义也大致稳定，以《北斗七元星灯仪》、《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经》为例，北斗七星各有度厄、保命、益算、消灾、散祸、扶衰之能，或主生死、长寿、伤暴诛斩等，内容以及措词上相同于前者更多一些。

密教中的北斗崇拜，较集中地出现于唐代的四部以“北斗”为题的经文中，其中北斗的司主相当明晰，如：

须知北斗七星管人生命，一生之中所有灾厄，官事口舌、釜鸣百怪，若遇此经，信敬供养，一无妨害。（《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

修此北斗七星护摩法者，刊于死籍，记长寿札，神验最明。延命、增算、除

^① 道经的年代多有不详，此篇经文，根据朱越利《道藏分类题解》中的注释，为六朝时期的经文。华夏出版社，1996年。

灾、招富、延命之法无如此者也。（《北斗七星护摩法》）

两种经文除了内容几乎一致之外，对北斗的醮祝和护摩方式、过程中所使用的祝告之词也都十分接近。前辈学者尝由这几部经文论述密教受到道教北斗崇拜的影响，如麦谷邦夫先生《道教与日本古代的北辰北斗信仰》中对密经中的星斗仪轨持“强烈地受到了道教司命神说与庚申信仰的影响”的态度，又萧登福先生的《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也从道经多使用的醮祝用语，如“急急如律令”、如北斗七星的“贪狼”“破军”的名称等以及醮祝和仪轨之间形式和步骤上的接近等多处出发举例论证。

4、“北斗八女”之“八”并非北斗之辅星

首先，道教中的北斗与历代天文志中的北斗，出于两个体系。北斗崇拜由来已久，《鹖冠子》中记载有：“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根据陈久金的考证，这来自比北斗七星更早的北斗九星（在斗柄延长线上另有招摇、玄戈二星）。在历代天官书、天文志中，北斗以“帝车”的形象出现，“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史记》，第27卷，页1291）《史记·天官书》中对辅星的描述为：“辅星明近，辅臣亲强。斥小，疏弱。”《史记正义》对其笺注为：“大臣之象也。占：欲其小而明。若大而明，则臣夺君政。小而不明，则臣不任职。明大与斗合，国兵暴起。暗而远斗，臣不死则夺。”（《史记》第27卷，页1293）《晋书·天文志》中，引《石氏星经》，则将北斗七星分别对应为：第一正星，主阳德，天子之象；第二法星，主阴刑，女主之位；第三令星，主中祸；第四伐星，主天理，伐无道；第五杀星，主中央，助四旁，杀有罪；第六危星，主天仓五谷；第七部星，主兵。同时将分野说运用到北斗之上。（《晋书》第11卷，页290、291）其中“辅星傅乎开阳，所以佐斗成功，丞相之象也。七政星明，其国昌。辅星明，则臣强”。（《晋书》第11卷，页291）

在被归于刘表（142—208）名下的《荆州占》中，则将北斗七星分别对应朝臣，“北斗第一星不明，御史大夫非其人也；第二星不明，大司农非其人也；第三星不明，少府非其人也；第四星不明，光禄非其人也；第五星不明，鸿胪非其人也；第六星不明，廷尉非其人也；第七星不明，执金吾非其人也。”（《荆州占》原书已佚，在《乙巳占》和《开元占经》中多有引用。此条，见《开元占经》第65卷《石氏中官》中“北斗星占第五十八”）

在这套官方的天文志体系中，北斗所主虽然有一些差异，但是与道教中它所司主的个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所得所失截然不同，在天文志的体系中，北斗是与王政乃至战争紧密联系的。所以“斗为帝车”图中的辅星，应当属于这一体系，辅星即作为丞相之象。从《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中所呈现出的内容来看，它将北斗各星与菩萨世界建立起了——一对应的关系，如“南无贪狼星，是东方最胜世界运意通证如来佛”，同时在经文中使用到了生辰说，这部经文的体例十分完整，北斗信仰也已经相当成熟，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此经产生较晚，其中北斗的形象是经过了多次的融合的。

其次，道教中存在北斗辅弼星说，存在北斗九星，但北斗九星首先是北斗七星和二

帝星的总称。在考究和道教北斗崇拜十分接近的密教中北斗第八星时，考查道教北斗第八星指向是非常必要的。道经中出现过北斗九星，但除一般所讲的大熊座七星以外的二星，是有不同的所指的。大致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第八星为帝星，第九星为尊星；一是第八、第九分别是辅、弼二星；三是帝星和尊星的余晖化为辅、弼二星。见下文示例：

第一太星玄枢阳明……第二元星北台阴精天王睿……第三真星九极上真上真元人天机……第四纽星璇根玄冥天权……第五纲星天平丹元玉衡……第六纪星命机北极开阳……第七关星玄阳天关瑶光……第八帝星高上玉皇第九尊星太微玉帝……

（六朝时的道经《上清太上回元隐道除罪籍经》，《上清洞真解过诀》中的《太上回元隐道用除罪籍回元五通之日谢过第七》中同此）

此经中第八星为帝星高上玉皇。

北斗第一阳明贪狼太星君……北斗第六北极武曲纪星君，北斗第七天关破军关星君，北斗第八洞名外辅星君，北斗第九隐光内弼星君子。（《太上玄灵北斗本命延生真经》，道藏第11册，页346）

应现九皇道体，一曰天皇二曰紫微三曰贪狼……九曰破军。天皇紫微尊帝二星，居斗口婆罗上宫，真光大如车轮，得见之者身得长生，位证真仙永不轮转。二星分作余晖，为左辅右弼。（《太上玄灵斗姆大圣元君本命延生心经》）

其中第三例，帝星和尊星化余晖为辅弼，调和前两例，可能是中间状态。另外，宋代《云笈七籤》所收《北极七元紫庭秘诀》中，对北斗称名为北斗七星，辅星弼星，北斗“第八帝星高上玉皇景光君，见，增三百岁。第九尊星太微玉帝神君，又云大帝七辰元君，见，增六百岁。”此经称“吴赤乌二年，葛仙公受之于太上。魏朝时，叶先生传之于世”（《云笈七籤》卷二十五 日月星辰部三。《道藏》中写此经名为《北帝七元紫庭延生秘诀》）。以此为据，则道教中的北斗九星应起于帝星尊星，而后加入了辅弼二星。从例三可知，帝星和尊星当处于斗口附近。

在《玉清无上灵宝自然北斗本生真经》中有真人求示于元始上帝“中天七星巍巍赫奕，统御群曜，斡旋气运，斟酌生死，威力至重。以何因缘殊胜第一，起自何劫、始终之化”，后借元始上帝之口，叙述北斗之来由：

昔在龙汉有一国王，其名周御，圣德无边……有玉妃明哲慈慧，号曰紫光夫人，誓尘劫中已发至愿，愿生圣子，辅佐乾坤以裨造化，后三千劫于此王出世。因上春日百花荣茂之时，游戏后苑，至金莲花温玉池边脱服澡盥，忽有所感。莲花九苞应时开发，化生九子，其二长子是为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其七幼子是为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之星……于玉池中经于七日七夜结为光明飞居中极……二长帝君居紫微垣太虚宫中勾陈之位，掌握符图纪纲元化，为众星之主领也。

考虑到岁差的因素，历史上的曾担任过“北极星”的恒星是有变化的，汉唐时最接近北极位置的是“北极天枢”，又称为“纽星”。“紫微大帝”所指应该是极星，也即是此星。天皇大帝也是一颗重要的恒星，处于勾陈四颗星的包围之内。《通占大象历星经》

中对此记载：“天皇大帝一星，在勾陈中央也。不记数皆是一星，在五帝前，坐万神辅，录图也。其神曰耀魄，主御君灵也。”在陈久金的《天象解码》中，提到此星极为重要，“按推理来说，应该是历史上的一颗极星，但就其位置而言，它又不该早于钩陈一作为极星。笔者认为，它可能就是指纽星，是后世某些整理星名的天文学家将它的方位弄错了”。联系此段经文，天皇大帝星之后可能还藏有其他文化渊源，但可以猜测，它是一颗具有重要文化意味的恒星。也即北斗的构成，是北斗七星加上具有文化意味的天皇大帝和作为极星的北极天枢。

5、“北斗八星”所指极可能是北斗和极星的合称

《佛本行经》卷二《瓶沙王问事第十三品》中，经文写道：

太子批袈裟，体宜则鲜明。犹如盛秋月，紫云所缠绕。林藪有梵志，隐居学神仙。见太子往至，皆怀愕然心。熟视观太子，不能往其。怀疑良久顷，乃还相谓曰：得无是北斗，七星第八者？……或名曰天子，或言月天降。於其中有一，智达梵志曰：“得无是梵天，自下至此林？”……

《佛本行经》讲述佛祖释迦由尽享繁华奢靡生活的储君而生修行之心，遁迹修佛的故事。梵志以“七星第八者”来比喻身著袈裟太子，惊喜赞叹。此七星之“七”，显见不是代表数量的“七”，而是另有所指。此经充满夸张的比喻，前几品中，将太子游览之时乘坐七宝之船比喻为如日乘船，又将太子与诸多妃子澡浴喻为众星拱日，此品中出现的日天子、月天。

以“七星第八者”来描绘释迦，两者之间的联系可以在佛经中对北辰的解释找到：妙见大士、妙见菩萨等，北斗七星之名也。有神咒拥护国土，经中不明其本地。诸师异说，或以为释迦，或以为观音，或以为药师。^①故此可得知此第八者身份极高，与北斗辅星相较，它所指的更可能是北极星了。此经为释宝云的译本，可知刘宋时即有“北斗第八星”的说法，与“北斗八星”同出一辙。此外，在七星仪轨中，北斗“七星”或作为整体受到供养，或如《梵天火罗九曜》各为本命星，均不见辅星有所司属。

密教中的北斗信仰出现得很早，在元魏婆罗门瞿昙般若流支翻译的《正法念处经》第二十四卷中即有比较简单的记录，正统佛教在这里讥讽密教“诸外道等见此辰星、北斗七星常现不没，便谓此星能持一切世间国土”。从此经的汉译中，可以见到极星和北斗组成一个整体而使用的痕迹。

而极、斗共称，在道经中也是常见的。除前文提到的紫微大帝之外，《葛仙公礼北斗法》中连用极斗：“镇上玄元北极北斗，从王侯及于士庶尽皆属北斗七星”（此经附于《梵天火罗九曜》之后）。

从道经中的北斗九子，由大熊座七星和北极天枢以及天皇大帝二星构成来看，极有可能在脱离了一定的文化背景之后，即道教的北斗崇拜通过某种形式传达给密教之后，天皇大帝星因为不是极星并且不是一颗大的恒星而被忽略，留下极星与七星共同构筑成北斗八星。在此推测中，如果在密教中保留了对印度不适用的道教因素，则可以成为更

^① 具体可参见丁福保《佛学辞典》中，“北辰”、“北极”、“妙见菩萨”条。

有力的证据，但是密教这支教派本身，是掌握天文知识的，这一点区别于显宗佛教。

6、八星之八“女”之称可能来自道经

萧登福先生在《道教星斗符印与佛教密宗》一书第二编第五节“受道教推崇斗宿星神的影响，密教对北斗二十八宿星神迹示现之说渐多”中，举《成菩提集》卷三之唐文宗游终南山遇见一位女仙，问之得知其“姊妹七人，是北斗七星管。不问男子女子，生下使属吾管”。又举《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经》中记汉明帝游终南山遇见北斗女仙，萧先生以《成菩提集》抄袭《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经》例证道教对密教的影响。

《太上北斗二十八章经》中记载：

昔汉明帝游终南山，见一女人，身著衣，被发跣足，端然坐石不起。帝曰：“朕为天下兆民之主，卿是何人，见朕失仪。”女子答曰：“吾是昊天玉皇上帝车之臣，北极七元掌籍之星君。是何人教吾失礼？”帝龙颜失色，稽首拜谢……

《北斗七星念诵仪轨》中女性星神的出处可能也在于此。此外，在道教经文中，一般尊称元君者，都为女性星神，如斗姆天姥即被尊为斗姆元君，北斗七星也出现过被称为元君之处，也许可以从侧面对“女”说有所旁证。对照佛道经文，可知“八”当不是“七”的讹写，“八女”之说几可成立，但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证据进一步加以证明。

二、密教佛经中的南斗

1、唐以前密经中的星斗崇拜已被汉化

考究密教星斗崇拜在唐之前是否具有受到道教影响的可能，则需要做更早的比较。笔者认为，密教佛经中与北斗一起出现的“南斗”可以说明问题。

中国的二十八宿体系中，“南斗”指斗宿；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记有“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故事^①，《度人经》，被称为三国吴时太极徐真人所传，内中也提到：“北斗落死，南斗上生”。

虽然在密教佛经和道教经文中都有北斗南斗的连用，但中印两地对斗宿的划分却是不同的。

中国的南斗包括六颗星，因为形状如勺而得名，印度的斗宿共四颗星，常以“象足”来形容，又因为四星几乎处于矩形的四个顶点，也有经文中将之称为“狱”，如梁代的《阿吒婆响鬼神大将上佛陀罗尼经》中写：“若咒鬼神病，知姓名以刀往。即忽打放之三度即差。收付南斗狱”。咒中南斗同时与人的生命发生了联系，下文又有“若于他家治病者，当追灶君问之，即知吉凶。实者使南斗君打禁，善女人即来说善恶也。凡有人病，信者治之，不信者一阐提，不须治难差”，到了唐代善无畏的经文中，则直接出现了“南斗注生，北斗注死”的文句（《阿咤薄俱元帅大将上佛陀罗尼经修行法仪

^① 干宝的《搜神记》，第54则，管辂（二）中，记有南斗仙人改写北斗仙人手中的文书来救人活命的故事。“南斗注生，北斗注死。凡人受胎，皆从南斗过北斗。所有祈向，皆向北斗。”见《搜神记·唐宋传奇集》，曹光甫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轨》卷中)。隋吉藏在所撰《仁王般若经疏》中提出“南斗、北斗，非宿是曜”，笔者认为，这一说法是将“南斗”从作为二十八宿^①的天文度量意义中剥离出来，而将之作为“星”来强调它的星占意义。

2、《北斗七星护摩法》，南斗的再次汉化和僧一行的工作

在唐代的四部密教北斗经文中，《北斗七星护摩法》是身兼天文学家和密教阿闍梨两重身份的僧一行所撰写的，此经末尾附有“炽盛光法”，结印并念诵此段真言，可以使“五星诸曜凌逼诸座不能为灾害”，经文中特意以南斗为例：

火星欲入南斗，应于一忿怒尊像下点南斗形及点火星，于此中画彼设睹噜形并书名于心上，即结印安印于忿怒像身上，诵真言七遍。于“娑 诃”句加彼设 噜^②名，忿怒厉声诵真言，所有灾祸移去。

“设睹噜”为梵文的直接音译，意思是“冤家”。经中描述的做法是，在忿怒的尊像前放置南斗以及火星的“形”，同时绘出火星的“设睹噜”即冤家的画像，并写上名字，而后结印念诵真言，以火星的“设睹噜”扰乱火星为害南斗，从而移除灾祸。

密经中出现“火星入南斗”这一中国传统天学中的重要天象，在此经中是首次。火星入南斗的天象在中国天文志的星占体系中具有“将乱”、“易政”、“为丧”、“天子下殿走”等等凶险的含义，如：

“火星入南斗，天子下殿走”（《宋史》，第280卷，页9510）

孙权赤乌十三年夏五月，日北至，荧惑逆行，入南斗。案占：“荧惑入南斗，三月吴王死。”（《晋书》第13卷，页364）

熹平元年十月，荧惑入南斗中。占曰：“荧惑所守为兵乱。”（《后汉书》，第102卷，页1058）

能够以密教仪轨顾及到官方星占体系中的“南斗”，就是历学家一行的特殊综合了。

三、结论与讨论

1、在密教佛经中，对北斗的描述是有差别的。金刚智译文中的“北斗八星”指的是北斗七星和北极星的总称，区别于《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北斗称名图中所绘的北斗七星以及辅星，后者的八颗星也构成了一种“北斗八星”的称名。笔者猜测，《七星延命经》中的八星，是学习了天文志中对北斗称名的结果。

“北斗八女”在唐代的北斗经中昙花一现，金刚智是否能在译经时，已经对道教中的北斗崇拜有详尽的掌握，并将其融会在翻译的过程中，这存在疑问。此外，密经被汉化的发生地是否有可能发生在中土之外，金刚智的译文是否有可能是密教将受到了道教

^① 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二十八宿，即是指的绕天一周的二十八个天区，它们宽窄不等，各有名称。二十八宿是描述天象位置的重要参照体系。南斗，也即斗宿，是北方七宿的首宿。印度有二十七宿、二十八宿两种体系。

^② 设睹噜，Śatru，又作设睹嚧、设咄噜、舍睹嚧、烁睹嚧、娑訖噜、宰睹唤。译曰怨家。希麟音义六曰：“设咄嚧，或云宰睹噜。皆梵语轻重，此云冤家。即于一切善法作冤害者。”

影响之后将对北斗崇拜的理解付诸于文重新传回中土，也是有疑问的。但可以解释的是，一如经中所写的“其印明出金刚顶经七星品”，可知对于北斗的称名，有源可溯，金刚智完全可以参学前人的工作，可惜的是，所说的《金刚顶经·七星品》，今已无法得见矣！

2、检索汉译密教佛经中北斗和北极有通用的现象，而又将北极星称为北斗的第八星，但是对前七星位置顺序的记录并不统一，也没有出现“北斗第一”“北斗第二”之类的指称。对北斗七星的称名，选用了道经中使用的“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对七星的排列顺序出现两种：一是从贪狼到破军，如金刚智所译《北斗七星念诵仪轨》，一行所撰《北斗七星护摩法》，灌顶所述的《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婆罗门僧的《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另有七星顺序自破军至于贪狼，即从北斗的勺柄排向勺口，有标注一行禅师修述的《梵天火罗九曜》^①，金俱吒集的《七曜攘灾诀》^②，《七千佛神符经》。将七星排列顺序和经文生成年代对照，很难得出某种规律性的解释，但七星排列顺序存在差异，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密教佛经中北斗系统的约定的规则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或许也能够说明北斗体系并不完善。

3、从北斗崇拜本身来看唐代的四部北斗经文，其产生的顺序是：金刚智所译《北斗七星念诵仪轨》，一行所撰《北斗七星护摩法》，《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最晚。《延命经》体例最完整，内容最详细，题注中只写“婆罗门僧将到此经唐朝受持”，没有具体人名和译著信息，但从这条题注的措词中能够体会出它强调着这部重要的佛经是密教僧人请至唐朝接受供养的。内容完备标注清晰但不写具体人名，由此也可以说明，这部《延命经》是将北斗信仰融会贯通之后的综合之作。另有记为大兴善寺灌顶阿闍梨述的《北斗七星护摩秘要仪轨》，其中出现了使用道教中的“算”、“纪”的概念，但使用过程中弄混淆了两词的意义。

4、僧一行的《北斗七星护摩法》和金刚智的《北斗七星念诵仪轨》，两部经文同属开元年间，自金刚智来华（719）至一行圆寂（727），前后相距8年，一写一译，很具有可比性。

在供养北斗以求福报外，“北斗八女”的称名方式，可以被认为是金刚智吸收了道教星斗崇拜对密教佛经的影响而使用在译文中。僧一行所撰《北斗七星护摩法》中，除北斗的象征意味之外，采用的祝文（见前文所引）在形式上完全相同于道经，萧文中也指出过整个仪轨的顺序，念诵真言一结涂香、奉花、烧香、奉食、燃灯印一赞叹一结招北斗一想北斗来赴的形式，也相同于道教的醮祝程序。通过一行的增补，密经北斗的道教色彩更为浓重了。

一行经文和金刚智翻译的经文，虽然同是受到道教影响，但所展现的内容是有所

^① 《梵天火罗九曜》的作者和经文生成年代，学界有所争议。钮卫星通过推算罗喉和计都的行年，认为此经的产生，不晚于公元751年。见《〈梵天火罗九曜〉考释及其撰写年代和作者问题探讨》，《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4卷第4期（2005年）：319-329。

^② 《七曜攘灾诀》为公元九世纪的集本。

区别的。这两部同时代同主题经文的区别，表现出了道教的星斗崇拜对密教佛经的二次影响。特别是一行在经中首次加入的对“火星入南斗”，完全是中土星占学的色彩，更是明证。

5、道教中直接关乎个人生命和灾福的北斗崇拜和在历代天文志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北斗信仰并行不悖，构成了二水中分的一种很有意思的局面。道教中的南斗崇拜虽然与北斗相同，基本都以延命最为要紧，并且在全唐文中可以看到不少民间的祭祀南斗之醮祝文辞，这说明民间也是风行过南斗崇拜的，但南斗的其影响无法同北斗相提并论。

这一现象的产生，应当是处于恒显圈中的北斗容易观测，其次两套北斗体系的文化涵义共同赋予了北斗特殊的地位。理解了北斗的特殊身份并了解在唐代产生的密教中的北斗经文，就能够理解，何以唐代的两大天文学家，李淳风和僧一行会在传记或笔记故事中，都与北斗发生联系^①，同时北斗还会牵连到婆罗门僧人，并联系到国家最高统治者了。

（责任编辑 于光）

^①《宋高僧传》卷五“唐中岳嵩阳寺一行传”中，记有一行作法使北斗七星不见的故事。具体参见《大正藏》第50册，页732。《隋唐嘉话》补遗中录有另一则李淳风与北斗的故事。“李淳风奏：‘北斗七星官化为人，明日至西市饮酒。’使人候之，有僧七人共饮二石，太宗遣人召之，七人笑曰：‘此必李淳风小儿言我也。’忽不见。”具体参见《隋唐嘉话·朝野佥录》页58—59，中华书局，2005，1。

《王孺童佛学论著集》出版

近日，《王孺童佛学论著集》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本论著集收录了王孺童先生10余年来所撰写之全部佛学文字。卷一为《百喻经释义》，全经通过98则譬喻，来阐发佛教甚深义理。由于该经行文优美，故事风趣幽默，所以一经行世，就受到广泛欢迎。鲁迅先生对其评价甚高，并曾出资刻印。卷二为《佛传——〈释迦如来应化事迹〉注译》，该书是对清代以来流传甚广的《释迦如来应化事迹》的注译，其从70余部佛教典籍中辑录208则有关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每则配插图一幅，形象地展示了释迦牟尼佛其诞生、出家、修行、成道、说法、涅槃，和未出生前的因缘及涅槃后佛法的传承，以及佛法传入中国的整个过程。卷三为《佛教三字经汇解》、《金刚经述义》、《正信录校注》。《佛教三字经汇解》汇编了《释教三字经》、《佛教初学课本》、《正学启蒙三字颂·述佛》正续三种“佛教三字经”，将三书依成书先后顺序排列，厘清了三者之间的内在传承关系，纠正了世人张冠李戴、混为一谈之误。卷四为《内学杂谈》与《别时意趣与净土教》。《内学杂谈》汇集作者10年佛学研究之文章而成，内容为佛教常识略说、佛教文史评述、佛教文献考订等，其中一些文章之写作背景、文献价值等，前加按语说明。前书为文章汇编，后书为佛学专题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该论著集中有很多重要佛学研究成果。比如《百喻经》流传至今只存98喻，而经作者的详细考证，将自古以来缺失的两则譬喻，还之完整。像《佛教三字经》目前所有的流布本，皆将作者署名为明代吹万老人，而其正文实际为清末民初杨仁山撰本，故此次亦将明代原本呈现旧貌。再有，“别时意趣”为佛陀“四意四密”说法之一，是对后世中国佛教净土信仰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之佛学概念，但至今无人对其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别时意趣与净土教》就填补了这一佛学研究领域的空白。（杨桦）

through utilizing this system to reduce the number of monks by Qianlong. The combination of the internal cause(five contradictions) with external cause(four conditions) was the real reason for abolishing i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Eight Women of the North Star”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Sinologization of South Star and North Star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Secret Buddhist Sutra

Wu Hui

The sutras of the Big Dipper mainly appeared in Kaiyuan and Tianbao of Tang Dynasty. One of them is 北斗七星念诵仪轨, translated by the Indian Buddhist monk Jin Gangzhi (Vajrabodhi). In this sutra the number of the Big Dipper in title is different from which in the text. And there is also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the number of the Big Dipper among the three editions of this sutra. I think it is effected by the Taoism that the translator added the polaris into the Big Dipper. Another sutra is 北斗七星护摩法, translated by the Buddhist monk Yi Xing who is also an astronomer. It is important that Yi Xing described the Mars' Progressing into Nandou and added the horoscopy of ancient China into this sutra. Comparing the canons of Taoism with sutras we can conclude that worshipping the Big Dipper in Buddhist Esoterism was inflected by Taoism.

On the Christian Culture and Humane Spirit in Chinese Modern Writers

Yang Jianlong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rospecting and criticizing the Chinese Confucian cultural tradition, the Christian culture become the ideological weapon to criticized the Confucian cultural tradition. Many Chinese writers were influenced by the Christian culture, in their works, they praised saving spirit highly, described the scenes of love others just like love themselves, pursued self-value, which made their works present either many or few humane spirit and it take important effect in humanitarianism's spout and develop in China.